

華裔哈佛 24 歲男孩,從政 3 年當選南舊金山市長

據 SM 日報 12 月 28 日報導 12 月 7 日市議會重組活動中,南舊金山(專題)市議員投票選舉詹姆斯·科爾曼為市長,Eddie Flores 為副市長。現年 24 歲的科爾曼有華裔(專題)血統,畢業于哈佛大學,是加州(專題)乃至全美最年輕的市長。

南舊金山市長詹姆斯·科爾曼 (James Coleman) 表示:“我很榮幸宣誓就職,成為南舊金山最年輕的,也是第一位公開的 LGBTQ+ 市長。我的優先事項很明確,我將努力建設一座讓所有孩子和成長中的家庭蓬勃發展的城市。”

Coleman 於 2020 年 11 月當選為市議會議員。科爾曼擁有華裔血統,在南舊金山出生長大,曾就讀于龐德羅薩小學、阿爾塔塔馬中學和南舊金山高中。後 Coleman 就讀哈佛大學,獲得生物學和政治學學士學位。他讀到大三時,由於新冠疫情他回到了南舊金山,此後成功競選市議員,並在 21 歲時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也是第一位公開在市議會任職的 LGBTQ+ 人士。現年 24 歲的 Coleman 是加州乃至全美最年輕的市長之一。

22 歲的他因新冠疫情回到灣區,當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頻發,Coleman 與同齡人一起參加當地市議會會議希望警察對此負責。他們的抗議還包括 2012 年 15 歲的德里克·蓋恩斯 (Derrick Gaines) 被警察殺死的執法爭議。

“他比我大 3 歲。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認識他,也認識他的家人,我們希望利用這種全國性的熱情,帶來南舊金山的真實變革,”Coleman

說。由於當時市議會對公眾禁言,Coleman 逐漸對即將舉行的地區選舉感到沮喪,於是決定與當地的 Garbarino 競爭,致力於將更年輕、更進步的聲音帶入社區。

“一群身無分文的大學生”發起的競選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他不僅成為唯一的 Z 世代議員,而且還成為該市第一個公開當選擔任該職位的 LGBTQ+ 人士。

但這場運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於 2020 年的社會矛盾,運動特點是政治和社會清算呼聲的狂熱激增。隨著過去幾年這種熱情的消散,包括 Coleman 在內的當時當選的領導人正在考慮如何經受住選民不斷波動的情緒。

“環境確實不同了,”他說,“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生活成本,以及如何買得起房或如何支付房租。”

他當選後不久就成立了種族和社會公平委員會,旨在對警察部門改革提出建議。現如今,雖說解決警察暴力現象仍是棘手的社會問題,但其在處理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的方法方面也

College student to South San Francisco mayor in 3 years

What the city's youngest and 1st LGBTQ mayor has learned in office and what he hopes to accomplish in the new year



取得了全面具體的進展。

“我認為,在公共安全方面我確實取得了進步,”他說。

他將資金充足的兒童保育等關鍵社會計劃視為對公共安全的重要投資。兒童保育計劃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旨在為符合條件的家庭提供兒童保育補貼。雖然與周圍的其他城市相比已經特別慷慨,但他表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特別讚揚了舊金山的 C 提案,該提案為幼兒教育服務提供更多資金。

Coleman 作為市長的首要任務是開展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他倡導大規模解決住房問題,解決策略之一是公共運營的方式。正如 Coleman 所說,公共住房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理想的居住地,而不是充滿耻辱並被視為社會頑疾。

他以最近的新加坡和香港(專題)之行爲例,宣揚社會公共住房的優勢和帶來的社會性效益。此外,他將住房保障視爲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奢侈品。

去年,他自己競選 21 區議會席位,學到了很

多關於制定住房政策的知識。儘管失敗了,但他表示,與州一級的權力人物會面讓他大開眼界,這反過來又幫助他瞭解如何最好地處理地方層面的政策。

雖然他不拒絕再次參加州級競選活動,但他目前專注於南舊金山。儘管有關於住房的宏偉構想以及在州政治中的未來,這位 24 歲的年輕人重申,他今年的另一優先事項是吸引他這個年齡的居民。

前市長弗洛·尼古拉斯是第一位擔任市長的菲律賓女性。在她之前,馬克·納加萊斯是第一任領導該市的菲律賓人。市議員馬克·阿迪瓦 (Mark Addiego) 於 1980 年首次擔任市長時是當地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

儘管在過去的幾年里一位公開的 LGBTQ 市長身份引發了爭議,但他表示,除了一些邊緣評論外,他沒有收到任何負面言論。

這位南舊金山本地人表示,議員的代表性如此多元化,“重要的是要代表所有年齡、背景和所有種族。如果你的委員會里都是 20 歲的人,你就不會有老年人的觀點。如果你有一個老年人委員會,你就不會有年輕人的觀點。我們有 Z 世代,有兩個 40 多歲的人,還有 60 多歲的人。我們真的很平衡。”

然而,年輕人從政有其缺點。雖然他的許多同齡人都在追求利潤豐厚的職業,但在公共部門從業意味著接受不同的財務道路。“我確實犧牲了收入,”他說,“但我仍然活成一個普通人,和朋友出去,有時會去 Dave & Busters、看 Netflix 或去健身房。”來源:舊金山華人資訊網

中美間諜戰 美亞裔官員稱遭不公正審查和任職限制

“我知道有幾十名外交官失去了到中國大陸、香港和越南工作的機會,”倫敦外交官由紀·近藤·沙(音)說。經過抗爭,她成功解除了赴日本工作的限制。

去年夏天,托馬斯·黃(音)得以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新的外交職務,這對他來說是洗清了污名。因為多年來他都在一個問題上與國務院苦苦抗爭,那就是他被認定爲某種情報威脅。十幾年前,他在加入外交部門時就曾被外交安全官員告知自己不可以前往中國工作。他說,他們在一封信中錯誤指控他有着語焉不詳的不適當“外國偏好”,並暗示他容易受到“外國勢力影響”。

在成爲一名美國外交官時,托馬斯·黃曾以爲中國會是他大展才能的地方。他在一個說中文的家庭長大,還曾到中國學習。從西點軍校畢業後,他曾前往巴爾干半島執行陸軍任務。在處理與美國最大軍事和經濟對手的關係問題上,他以爲自身經驗足以發揮價值。

隨着他對該禁令有了更深瞭解,他發現其他外交官——包括許多亞裔美國人——也面臨類似的限制。安全官員從來沒有給出確切理由,他們是根據初始安全許可審查過程中收集的信息秘密做出決定的。多年來,數以千計的外交官都曾受到限制。

涉及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美國政府機構也存在類似問題。在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間諜暗戰中,一些與亞洲——連偏遠小國都不例外——有聯繫的美國聯邦雇員聲稱,他們遭受了美國反情報和安全官員的不公正審查,並被禁止從事本可維護美國利益的工作。

他們認爲這種清忌會削弱美國,因爲它讓有能力的雇員無法在外交使團、情報部門和其他關鍵崗位上任職,他們流利的語言技能或文化背景原本能在這些崗位派上用場。

本報記者對來自多個國家安全機關的 20 多名現任及前任官員的採訪,以及對數十份國防部安全審核卷宗的查閱。

亞裔美國外交官提出最多抗議的這些問題十分迫切,以至於美國議員在 12 月通過了兩黨立法,試圖限制國務院的一些做法。12 月 14 日出台的軍費法案中包含了加州眾議員劉雲平 (Ted Lieu) 推動的舉措,旨在讓國防部的任職限制和審查流程更加透明。

“我們應該問問自己該如何應對風險,而不是將那些最有能力擔任公職崗位的人排除在外,”托馬斯·黃說。“這是自傷之舉。”

托馬斯·黃和其他人在內部提出異議之後,國務院最終撤銷了對他的禁令。除此之外,國務院還在拜登執政期間取消了 1400 項任職限制,國務卿布林肯去年宣佈將終止這類做法。

但仍有官員面臨障礙。《紐約時報》獲得的國務院數據顯示,目前仍有約 625 名國務院雇員處於禁令之下。國務院沒有給出理由。此外,在調查準備前往被認定構成特殊情報威脅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工作的雇員後,反情報官員有權建議實施禁令。

國務卿布林肯去年宣佈將終止委任限制的慣例,但障礙依然存在。

根據時報審閱並於本文首次曝光的採訪和文件,聯邦調查局的兩名反情報官員分別表示,這些雇員是因爲中國背景而遭到了同僚的迫害。

對中國間諜活動滲透美國機構的類似擔憂促使司法部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實施了“中國計劃”,當時聯邦調查局對美國政府內外的許多華裔科學家進行了調查,懷疑他們涉嫌非法協助中國。在司法部找不到間諜活動證據的一些案件中,官員會提起較輕指控,這些指控最終也會被撤銷——然而科學家的名譽和職業生涯已經受到損害。司法部於 2022 年叫停了“中國計

劃”。

國家安全機關內部的流程早在“中國計劃”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是在嚴格保密的安全許可和任務審查中進行的。因不是公開的刑事調查而較少受到公眾關注。

這些禁令的批評者認爲,相較於其他人,有親屬在中國的美國人並不會更容易變成中國的情報資產。他們表示,美國政府未能跟上近幾十年來人口結構巨變的步伐。在美國,四分之一的兒童至少有一位移民父母,約 20 年前這一比例爲 13%。中國仍是新入籍美國公民的主要來源國。

政府雇員沒有能力去改變這樣的家庭環境。但一些美國官員認爲,拒發安全許可或限制他們任職依然合理,因爲中國政府有通過拘留或騷擾中國親屬向外國公民施壓的記錄。

2021 年的立法所引用的國務院數據顯示,該機構對在華崗位的限制最多,其次是俄羅斯、台灣和以色列。一些俄裔美國外交官也受到了影響。

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稱其不會實行基於種族、民族或出身的歧視,布林肯也志在打造多元化的公務員隊伍。聲明還表示,國務院反情報程序的設置依據是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指引以及國務院外交事務手冊中概述的 13 項標準。

美國各級機構的確都有亞裔美國人擔任高官,亞洲政策制定也不例外。副總統哈里斯的母親來自印度,在內閣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戴琪父母都來自台灣。

但曾在國務院擔任外交官的新澤西州民主黨眾議員安迪·金錶示,政府各部門的亞裔美國雇員都曾向他提及對“始終籠罩着自己的陰影”的擔憂。

新澤西州民主黨眾議員安迪·金在國務院任職時曾被禁止參與涉及朝鮮半島問題的工作。安迪·金是韓裔美國人,他在十幾年前曾收到來自國務院的信函,信中稱他被禁止從事涉及朝鮮半島問題的工作。“那是我生涯中最被輕視、最感羞辱的時刻之一,”他說。

反間諜狩獵 許多聯邦政府機構都有自己的內部安全部門,負責對員工進行調查,通常不會通知員工,也不會透露調查過程。在聯邦調查局,這樣的部門會進行測謊,並可以建議部門暫停或撤銷雇員的安全許可。

在國務院,安全官員將利用常規安全許可背景調查中收集到的信息,加入決定是否採取特別措施,在外交官的檔案中加大外派限制。

對許多美國官員來說,獲得最初的絕密安全許可是一個惱人的過程,但這是他們的工作所必需的。申請者要列出他們在國外的聯繫,並接受對他們的個人關係、前雇主、財務歷史和生活方式的詳盡審查。安全官員可以用摺負巨額債務,或最近非法使用毒品等理由,拒絕或撤銷許可。

隨着對中國間諜能力的擔憂日益加劇,爲某些聯邦雇員和承包商設置的門檻似乎也隨之提高。根據時報對 30 多份文件的查閱,國防部在網上發佈的公開文件顯示,對中國過去 20 年間諜活動的評估內容變得更長、更詳細。

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不會實行基於種族、民族或出身的歧視。這些決定通常表示,與中國有聯繫的申請人面臨“非常沉重的負擔”,需要表明自己不構成潛在情報威脅。

在 2020 年的一項裁決中,一名 24 歲的國防合同工程師在中學時從中國移民到美國,被一名行政法官描述爲“忠誠的美國公民”,過着“典型的美國生活方式”。但法官寫道,他與中國家庭成員的聯繫雖然“完全正常”,但也構成了“被操縱或被誘騙的高風險”。他要求通過審判的上訴被駁回。

在 2022 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在美國出生、爲一家國防承包商工作的男子因其妻子的中國親屬而被拒絕獲得批准。法官承認,“脅迫是很少見的,”但他還說,“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而且爲了實現其目標,中國幾乎是不擇手段的。”

馬克·扎伊德是一名律師,曾代表數百名政府雇員就安全許可決定與各相關機構交涉,他說,“毫無疑問,亞裔比其他許多人更容易受到這種審查。”

國防部發言人蘇珊·戈夫表示,安全許可的決定是一項“基於風險的決定”,國防部的目標是核實每名雇員“是否值得那份特殊的信任,這份信任是代表我們的國家授予的”。

幾起公開案件揭露了聯邦部門內部的反間諜越界工作。2022 年 11 月,在中國出生、從事洪水預報工作的美國水文學家陳霞芬從商務部獲得了 180 萬美元的和解金,此前商務部官員指控她非法下載政府敏感數據,並錯誤地將她描繪成中國間諜。他們的懷疑是基於她與一位身爲中國地方官員的老同學的一次簡短交流。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她,但檢察官最終撤銷了指控。

“他們認定了你是間諜,他們只想證明自己的理論,”陳霞芬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出生的美國水文學家陳霞芬從商務部獲得了 180 萬美元的和解金,此前商務部官員錯誤地將她描繪成中國間諜。

2021 年,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發佈了一份關於商務部安全部門的報告,報告顯示,陳霞芬是被非法調查的衆多華裔美國雇員之一。

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該部門是一支“胡作非爲、不負責任的警察部隊”,並廣泛針對了“亞裔美國員工比例相對較高”的辦公室。

“伴隨中國而來的污名” 就連從事中國反間諜工作的政府官員有時也被安全官員視爲潛在威脅。他們說,那些讓他們得以熟悉中國的背景,在安全官員眼中卻被打上了不公平的印記,令他們被視爲可能的間諜。

克里斯·王(音)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畢業後,成了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公室的一名反情報分析師。儘管他獲得了絕密的安全許可,但在 2011 年的第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說,他被列入一個名爲 PARM 的特殊內部監控項目,在這個項目中,他的聯繫人、旅行和電腦使用將受到安全官員的仔細審查。克里斯·王與時報分享的信件副本顯示,他還需頻繁接受測謊和面訪。

“你的外國聯繫和出國旅行增加了你被外國利用的風險,”信中寫道。克里斯·王曾在加州

接受中國武術老師的訓練,並在上海讀過半年本科。

2011 年,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事處新聘用的一名反情報分析師被告知,由於他的“國外聯繫和國外旅行”,他被置於一個特殊的內部監視項目中。他曾在加州接受中國武術老師的訓練,並在上海學習了半年。他的上司指派他從事針對中國的反情報工作。然後,在測謊失敗後,他無法獲得最敏感的信息;他說自己很緊張,因爲擔心被錯誤地指認與中國有不正當關係。

他說,雖然他通過了隨後的測謊和安全面試,成爲了一名特工,但後來官員告訴他,將對他進行行政調查,隨後他於 2020 年辭職。

“由於伴隨中國而來的污名,華裔美國人更有可能受到歧視,即使他們的聯繫在本質上是清白的,”克里斯·王說。

另一名從事反情報工作的前聯邦調查局官員杰森·李說,他正在起訴該機構的歧視行爲,乃至以國家安全爲幌子的不當行爲。他說,一名測謊審訊員曾指出,杰森·李的父親也在政府部門從事敏感工作,並錯誤地指責他是“父子中國間諜團夥”的一員。杰森·李說,這激怒了他,導致他沒有通過測試。

聯邦調查局拒絕就具體案件置評,但表示會公平地進行測謊。它還表示,“多元化是一項核心價值,”該局營造了一種讓員工“受到尊重,被鼓勵做自己,並獲得一切發展機會”的環境。被拒絕從事外交工作

在國務院,一個代表亞裔美國雇員的團體一直在努力推動該機構徹底改革外派限制。這帶來了 2016 年以來多項旨在迫使變革的法律。

“我知道有幾十名外交官失去了前往中國大陸、香港和越南的任務,”倫敦外交官由紀·近藤·沙(音)說。經過抗爭,她成功地解除了禁止她前往日本的任務限制。

儘管員工們對布林肯 3 月份宣佈放寬限制的聲明表示贊賞,但他們擔心另一項仍然存在的限制:一項名爲“任務審查”的條款,根據該條款,反間諜官員在對雇員進行例行調查後,可以建議禁止他們擔任部門官員認爲具有特殊情報威脅的職位。“這確實存在問題,”美國外交服務工會副主席蒂娜·黃(音)說。

這份職位清單是保密的,但時報瞭解到,除了中國之外,它還涉及俄羅斯、越南和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外交服務雇員工會副主席蒂娜·黃稱,反情報官員建議禁令的過程“確實存在問題”。

曾被美國國務院禁止在台灣工作的外交官斯塔利安·楊(音),爲雇員組織亞裔美國外交事務協會收集了有關官員被派往特別情報威脅國的數據。他說,自 2021 年以來,他已經追蹤了 22 起與亞洲有聯繫的員工被調查的時間超過一個月標準時間的案列。

該協會致信布林肯,表達了他們的擔憂。上個月,負責管理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翰·巴斯在時報獲得的一封信中回復說,在去年進行的 391 項任務審查調查中,只有 9 項的結果是建議拒絕。但外交官們表示,這一數字不包括在調查拖延後轉到其工作崗位的雇員。除了這些擔憂之外,還有一些有抱負的外交官更早遭到解雇,甚至沒有獲得安全許可。

在中國出生的 25 歲美國人鄭瑞琪(音)說,美國國務院告訴她,儘管她已經在國務院開始了一個門檻很高的獎學金項目,她的安全審查還是沒能通過。她說,在經歷了將近兩年的審查過程後,她於 2021 年被拒,原因是她與國外的家庭成員和其他人的聯繫。

“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告訴我,這事看上去太美好了,不可能成真,美國永遠不會接受像我這樣在外國出生的華裔美國人,”她說。“但我選擇了相信這個過程。”